

# 《西学东渐记》疑误辨析

张鑫洁<sup>1</sup>, 安歌<sup>2</sup>

(1.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 长沙 410082; 2. 内蒙古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呼和浩特 010022)

**摘要:**容闳撰写的《西学东渐记》是一部自传体回忆录,与曾国藩有关的章节中涉及到的时间点极易引发误解,因此有必要对此予以梳理说明。《西学东渐记》的有关内容为学术界研究曾国藩及其洋务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细读《西学东渐记》,辨析疑误,有助于进一步探究曾国藩对待西学的真实态度及对西学的接受程度。

**关键词:**容闳;《西学东渐记》;曾国藩

**中图分类号:**K207.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0)05-0044-05

容闳(1828—1913),原名光照,字达荫,号莼甫,广东香山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留学生事业之先驱。容闳自传体回忆录《西学东渐记》一直颇受学界关注,其中一些章节是有关曾国藩的内容。仔细研读《西学东渐记》的第十三章《与曾文正之谈话》、第十四章《购买机器》可以发现,这两章涉及到的时间点极易引发误解,因此有必要对此予以梳理说明。容闳笔下的曾国藩为学术界研究曾国藩及其洋务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有助于进一步探究曾国藩对待西学的真实态度及对西学的接受程度。

## 一、1863年的安庆之行是否为容闳首次拜谒曾国藩

据容闳在《与曾文正之谈话》一章中记述,他是于1863年(同治二年)九月间抵达安庆的:“予既将九江商业结束后,遂乘民船于九月间抵安庆,迳赴文正大营,得晤故人张世贵(张斯桂)、李善兰、华若汀、徐雪村等(译音)。”<sup>[1]73</sup>容闳不仅详细描述了在安庆期间与曾国藩两次会谈的细节,还将曾国藩的面貌特征一一写出,更有“余见文正时为一八六三年,文正已年逾花甲[实为五十二岁]”<sup>[1]75</sup>一语,以上种种言论表明在容闳的记忆中,此次安庆之旅是与曾国藩的第一次会面。但曾国藩首次谈及容闳却是在同治元年(1862)。

同治元年六月初九日,曾国藩在复桂超万的书信中讲道:“顷有洋商容光照来皖,言及礮炮之利,亦令赴沪试办,渐次习其作法,或有可成。”<sup>[2]363</sup>桂超万(1784—1863),字丹盟,安徽贵池人,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同治初署福建粮储道,后擢按察使。

曾国藩在同治元年已经见过容闳,赵烈文、莫友芝的日记均可为证。同治元年,时为曾国藩幕僚的赵烈文在五月初三的日记中记下了容闳来安庆之事。赵烈文(1832—1893),字惠甫,号能静居士,江苏常州阳湖人。同治元年正月入曾国藩幕府,颇具治世之才,主要办洋务、军务、盐务等事宜,深受曾国藩器重,后成为曾国藩核心幕僚之一。在赵烈文的记述中,左枢(?—1869,字梦星,湖南湘乡人。湘军将领,同治八年授贵州都匀知府,因平苗卒于阵)向赵烈文举荐容闳,之后赵烈文再向曾国藩举荐容闳。因左枢资料较少,现无法得知左枢从何处得知容闳。

金子香同广东友人容君淳甫(光照,香山人,通夷言夷字,曾居花旗八年,应其国贡举得隽,去年左孟辛函荐于我,属引见揆帅,故来)来。<sup>[3]497</sup>

赵烈文同治元年五月初四、初五、初七、初十的日记中有与容闳相往来的记述:

(同治元年五月初四日记)访周缙

收稿日期:2020-07-22

基金项目:2018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王闿运全集》”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鑫洁(1988—),女,河南郑州人,文学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后。

云、李壬叔、金子香、容淳甫，不遇。

同治四年(1865)十一月，二次归国后的容闳拜访赵烈文，赵烈文再次回忆举荐容闳之举：

又有远客容纯甫(光照，夷父，百粤母，余前荐之涂相者)新使米利坚购器回，阅时年半，历地数万里，涉道途景物，娓娓可听。<sup>[3]951</sup>

从赵烈文在日记中的反复提及可以看出，对容闳的举荐让他印象深刻，二人在曾国藩大营相识以后一直有往来。同治元年六月初七日，赵烈文曾致书容闳：“写容纯甫信，即日发交来足。”<sup>[3]531</sup>直到同治六年(1867)四月，容闳赴金陵之际还曾拜访赵烈文：“容纯甫来候。”<sup>[3]1045</sup>当时曾国藩首次回任两江总督，赵烈文于同年四月重回曾国藩幕府。可以说赵烈文与容闳之间是一直保持着联系的。赵烈文同治元年五月的日记成为容闳于同治元年拜谒曾国藩的第一条力证。

同在安庆的莫友芝同治元年五月初九日日记中也曾提及容闳：

过壬叔，识容醇甫(光照，香山人)。

壬叔谓其曾历海外诸国，读书八年，能解各国语言，方为鬼办茶，将往祁门。<sup>[4]89</sup>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号邵亭，晚号暉叟，贵州独山人，通于训诂，精于诗歌，工书法，长于金石目录，好收藏，喜游历，著有《邵亭遗诗》《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邵亭书画经眼录》《邵亭知见传本书目》等。道光二十七年(1847)，莫友芝入京会试期间偶然与已为翰林院侍讲学士的曾国藩相识。咸丰十一年(1861)六月二十四日，莫友芝奔赴曾国藩大营。后因家乡遭遇战乱，莫友芝一直追随曾国藩左右。

莫友芝在日记中将容闳安庆之行的目的说得很清楚，即容闳为办茶而来，莫友芝所说的“鬼”，指的是洋人。这一点，与容闳《西学东渐记》第十二章《太平县产茶地之旅行》的记述相吻合：

余从事贩茶之事，凡六阅月，前后共得绿茶六万五千箱，然尚不及太平县所有者十之一。<sup>[1]69</sup>

无论曾国藩的书信，还是赵烈文、莫友芝的日记都表明容闳于同治元年贩茶之际已在安庆面见过曾国藩。但此时的容闳作为一名商人，与曾国藩未有深谈。

据容闳回忆，同治二年赴安庆后，曾两次与曾国藩交谈，第一次是曾国藩对容闳个人进行了仔

细的考量：“总督又以锐利之眼光，将予自顶及踵，仔细估量，似欲察予外貌有异常人否。”<sup>[1]74</sup>第二次谈及购买机器之事，曾国藩在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记述了命容闳购买机器之事：

李壬叔、容纯甫等坐颇久。容名光照，一名闳，广东人，熟于外洋事，曾在花旗国寓居八年，余请之至外洋购买制器之器，将以二十六日成行也。<sup>[5]479</sup>

这意味着曾国藩日记中记述的这次会面，并不是容闳赴安庆后与曾国藩的第一次会面。第一次会面的时间，应是容闳记忆中的抵达安庆的次日：“抵安庆之明日，为予初登政治舞台之第一日。”<sup>[1]74</sup>

简言之，同治元年五月，容闳在赴安徽买茶期间首次拜谒曾国藩。次年九月，容闳再赴安庆，期间与曾国藩有两次会晤，其中，第二次会晤命容闳出洋购买机器。而曾国藩在日记中仅记述了第二次会见之情形。相较同治元年的会面，同治二年受曾国藩指派购买机器，对容闳与曾国藩来说，意义都非同寻常，这也是容闳与曾国藩记忆聚焦的原因所在。

对容闳来说，应允赴美购买机器只是他教育事业的“敲门砖”，容闳一生最大的事业是教育，“以教育计划言，是予视为最大事业，亦报国之唯一政策”<sup>[1]103</sup>。同治二年赴安庆拜谒曾国藩时，容闳已经绘制出其教育事业的蓝图，但因知曾国藩此番招揽的目的并不在此，故“将教育计划暂束之高阁，而以机器厂为前提”<sup>[1]77</sup>。同治四年，随着江南制造总局的建立，容闳先是向曾国藩建议于江南制造总局内开设兵工厂学校，作为其教育事业的“问路石”，后与丁日昌相商后方将教育计划向曾国藩和盘托出，在曾国藩的大力支持下，容闳的教育理想最终得以实现。

对曾国藩来说，他早在咸丰十一年就已提出“中国造”的设想：“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sup>[6]186</sup>因此，曾国藩对出洋购买机器之事非常重视：“一旦兵端或开，则办船办炮必责成吾辈海疆大吏。不如趁此闲暇之时，稍成三年之艾，免致临渴掘井，购买楛物，又为外人所挟制。”<sup>[7]246</sup>在容闳踏上了赴美之旅后，曾国藩心中对中国造充满了更多的期待：

瑞庵所购小轮船,日内当放来安庆一观。此间久思摹仿制造,因制器之具不全,特于十月间派容光照携资出洋,采办应用各物,不知将来果有成船之望否?<sup>[7]356</sup>

同治四年(1865)六月,曾国藩与李鸿章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同年十月,容闳回国,其所购机器全部入江南制造总局,后江南制造总局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军事工业基地。简言之,容闳帮助曾国藩实现了中国造的梦想,曾国藩帮容闳实现了留学教育的梦想,这才是二人记忆聚焦的真正原因所在,也是容闳与曾国藩相交时间节点容易引发误解的一大诱因所在。

## 二、曾国藩专折保奏容闳的时间

同治四年容闳回国,曾国藩已经北上剿捻。据容闳的回忆,归国后他与华蘅芳共赴徐州拜谒曾国藩,曾国藩予以专摺请奖之荣:“余往徐州谒文正,同行者为华君若汀。……曾督对于予之报告,极为嘉许。乃以予购办机器之事,专摺请奖。”<sup>[1]85</sup>离开徐州之前,他见过保奏的摺子:“予未离徐州前,即录此稿示予,以得曾督识拔为贺。”<sup>[1]86</sup>在徐州停留三日后,容闳回到上海,十月间得知保奏已得准:“十月间奉到曾督札文,谓保奏五品实官,已蒙核准。”<sup>[1]86</sup>说明在容闳的记忆中,他于同治四年十月得到曾国藩专摺保举并奉旨应允。这个时间记忆,与实际情况可谓是大相径庭。

首先,容闳抵达徐州的时间是在同治四年十二月,这一点,曾国藩有着清晰的记述:

(同治四年十二月初三日日记)见客,立见者一次,坐见者四次,容闳及张敬堂坐皆极久。

其次,曾国藩上折保奏容闳的具体时间为同治五年(1866)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上《容闳赴西洋采办铁厂机器有功请予奖励片》:

花翎运同衔容闳,熟悉泰西各国语言文字,往来花旗最久,颇有胆识,臣于同治二年十月拨给银两,飭令前往西洋,采办铁厂机器。四年十月回营,所购机器一百数十种,均交上海制造局收存备用。查该员不避险阻,涉历重洋,为时逾两年之久,计程越四万里而遥,实与古人出使绝域,其难相等,应予奖励,以昭激

劝。合无仰恳天恩,俯准以同知留于江苏遇缺即补。理合附片陈请,伏乞圣鉴训示。<sup>[8]314</sup>

曾国藩的奏章内容与容闳对奏章的记忆大略相同:“容某为留学西洋之中国学生,精通英文。此行历途万里,为时经年,备历艰辛,不负委托,庶几宏毅之选,不仅通译之材。拟请特授以候补同知,指省江苏,尽选补用,以示优异,而励有功。”<sup>[1]86</sup>这意味着,容闳在徐州期间已经见过奏章应是事实,但曾国藩保奏的时间却非容闳记忆中的“十月”。

## 三、曾国藩对西学的真实态度

从《西学东渐记》中可以看出,容闳对曾国藩的事功、政绩、修养、人品评价甚高,如“文正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sup>[1]73</sup>，“其所以成为大人物,乃在于道德过人”<sup>[1]76</sup>等。谈到曾国藩在购买机器一事的高瞻远瞩时,容闳亦不吝溢美之辞:

自予由美国采购机器归国以来,中国国家已筹备千百万现金,专储此厂,鳩工制造,冀其成为好望角以东之第一良好机器厂。故此厂实乃一永久之碑,可以纪念曾文正之高识远见。世无文正,则中国今日,正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机器厂否耶?<sup>[1]78</sup>

曾国藩的“高瞻远瞩”并不意味着对西学的全盘接受,曾、容第二次会谈时,曾国藩说过一句话颇耐人寻味。当容闳向曾国藩解释何为“制枪炮之各种机械”时,曾国藩并不感兴趣,表示“此事予不甚了了,徐、华二君研此有素,若其先与二君详细讨论,后再妥筹办法可耳”<sup>[1]78</sup>。曾国藩这句话有两层意思。

首先,精于义理、熟于经史、长于古文的曾国藩自曝学术短板,即对天文历算之学一窍不通:“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sup>[9]373</sup>这说明,容闳向曾国藩解释的各种机械原理时,曾国藩是不太感兴趣的。

其次,曾国藩所说的徐、华二君,指的是徐寿与华蘅芳。徐寿(1818—1884),字雪村,江苏无锡人。华蘅芳(1833—1902),字若汀,江苏金匮人。咸丰十一年,徐寿与华蘅芳被曾国藩招至安庆军械所后,制造轮船成为二人的工作重心。不懂天文历算的曾国藩之所以同意派遣容闳出洋购

买机器,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对身边西学之才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的器重。这些西学之才,是帮助曾国藩实现“中国制造”梦想的精英与骨干。同治元年七月,徐寿与华蘅芳制造出火轮船器汽机模型,曾国藩对试演效果非常满意:

中饭后,华蘅芳、徐寿所作火轮船之机来此试演。其法以水蒸气,气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气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约试演一时。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sup>[5]306</sup>

因此,曾国藩任命容闳出洋购买机器这一事件本身,根本原因在于西学带给曾国藩最大的冲击是他从西方技艺在战争中的巨大威力中看到了国家自强的希望。这是曾国藩在时局影响下做出的政治判断,而这个政治判断并不等于曾国藩本身对西学的全面接受。这一点,从曾国藩对子侄的教育中可窥见一斑。

曾国藩对科举考试非常重视,要求儿侄必须参加科考,读书也是按照科举考试而准备:“尔既作秀才,凡岁考科考,均应前往入场,此朝廷之功令,士子之职业也。”<sup>[10]164</sup>但相比于科举制艺,曾国藩的二儿子曾纪鸿更喜欢天文历算。曾纪鸿与李善兰相友善,参与了《几何原本》及《则古昔斋算学》的校刻,曾国藩虽然支持曾纪鸿学习历算,但他更希望曾纪鸿专注于科考。同治五年正月,曾国藩寄书曾纪鸿,要求他师从李榕研习制艺之道,暂时搁置算学的学习:

李申夫于八股试帖最善讲说。据渠论及,不过半年,即可使听者欢欣鼓舞、机趣洋溢而不能自己。尔到营后,弃去一切外事,即看《鉴》、临帖、算学等事皆当辍舍,专在八股试帖上讲求。<sup>[10]407</sup>

同年五月,曾国藩致书李善兰,一方面感谢李善兰在算学方面对二儿子曾纪鸿的指导,另一方面,“惟渠诗文俱未入门,尚乖登高自卑、先河后海之义耳”<sup>[11]249</sup>才是曾国藩真正的想法——他希望曾纪鸿的学业要以时文和应试书目为重。曾国藩对曾纪鸿的举业期许,直到同治九年(1870)三月他在复方骏谟的书信中仍有提及:“二小儿虽能略通算术,鄙意则深望其究心举业。在署苦我

讲授之师,今岁有荐贵乡潘擷珊者,现已延请入署,不审果有进步否。”<sup>[12]180</sup>可以看出,困于封建统治泥淖里的曾国藩一直坚守着中国传统文化为思想阵地,竭力维护理学的统治地位,虽然以开明的姿态对待西学,以图自强,睁开了看世界的“双眼”,但却没有将西学从“用”的地位上升到“术”的地位,未能全面理解并认识西学的价值,这也是儒家文化培养的曾国藩与西学培养出来的容闳最根本的区别。这也是后来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所在。

从容闳的《西学东渐记》中有关曾国藩的内容可以看出,该书并没有准确记述他与曾国藩初次会面时间,对曾国藩专折保奏日期记录亦不准确,也没有真正理解曾国藩对待西学的真实态度。同治元年,容闳已面见曾国藩,容闳回忆录中的记述,是容闳第二次面见曾国藩的时间。曾国藩同治五年十二月,正式上奏折保奏容闳。曾国藩视西学为“技艺”,是他对西学最真实的态度,而对容闳教育事业的支持,也是建立在学子留洋后仍必须要研读经史的基础上。尽管如此,容闳对曾国藩的推崇是无庸置疑的,尤其是曾国藩对容闳教育事业的支持,更让其终生感念。

## 参考文献:

- [1]容闳.西学东渐记[M].长沙:岳麓书社,2015.
- [2]曾国藩.书信四[M]//曾国藩全集(第25册).长沙:岳麓书社,2012.
- [3]赵烈文.能静居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2013.
- [4]莫友芝.莫友芝日记[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
- [5]曾国藩.日记二[M]//曾国藩全集(第17册).长沙:岳麓书社,2012.
- [6]曾国藩.奏稿三[M]//曾国藩全集(第3册).长沙:岳麓书社,2012.
- [7]曾国藩.书信六[M]//曾国藩全集(第27册).长沙:岳麓书社,2012.
- [8]曾国藩.奏稿九[M]//曾国藩全集(第9册).长沙:岳麓书社,2012.
- [9]曾国藩.家书一[M]//曾国藩全集(第20册).长沙:岳麓书社,2012.
- [10]曾国藩.家书二[M]//曾国藩全集(第21册).长沙:岳麓书社,2012.
- [11]曾国藩.书信八[M]//曾国藩全集(第29册).长沙:岳麓书社,2012.
- [12]曾国藩.书信十[M]//曾国藩全集(第31册).长沙:岳麓书社,2012.

